

新世纪蒙古文生态小说（长篇）简论

全福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落实，作家们更加直面现实，能自由抒发内心世界了。他们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从作家的责任心出发，写出了反映生态问题的诸多小说，向读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朋友关系，进而深入探讨了生态失衡的各种原因。本文主要对新世纪出版的7部蒙古文长篇小说，分别从“生态意识的复苏”、“生态小说的思想倾向”和“生态失衡的探索”等三个论题，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概括出了“人”是破坏生态的主要力量，要解决生态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坚持和谐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等见解。

关键词：新世纪；生态小说；生态意识；思想倾向

中图分类号：I3/7079 **文献标识码：**A

一、生态意识的复苏

自古以来蒙古人的生态意识非常浓厚。细察被人褒贬的诸如“靠天养畜”、“天父地母”等话语，从中亦能窥见其依赖大自然的恩赐、敬畏大自然和崇拜大自然的心理印迹。这种伦理性的和谐关系，在风调雨顺的大年不被人们所关注，而天灾不断的小年就会变成关乎人们生命的大事。

当前，在世界、中国，尤其在蒙古地区生态问题已上升到突出的位置，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这一现实早已反映到作家和专家的脑子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兼作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文，描述了化学药物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灾害。这篇文章被人们誉为“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除此而外，还有俄国作家米·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大自然的日历》、《鸟儿不惊的地方》，美国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徐刚的《伐木人，醒悟吧！》，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银狐》、《大漠魂》、《大漠狼孩》…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基调上有所不同，或喜或悲，情感各异，但关注的问题都是生态。随着形势的发展，于1972、1974、1984、1987、1992、1994、2002年，连续召开了世界性的有关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发表相关章程和决议书并付诸实施。^[1]

蒙古文生态小说的崛起，是离不开这一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从自身生存环境的危机中滋生出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的生态意识的结果。2007年，由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额尔敦格日勒、2008年由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席海英二人，分别以新世纪蒙古文生态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

据我个人统计，新时期蒙古文生态小说自从1980年代初开始。满都麦是较早发表生态小说，而且他是写得较好、较多的一位作家，至今已发表《雅玛特老人》、《猎人和四耳狼》、《瑞兆之源》、《马鸣狗吠人哭》、《在草原深处》、《骏马野狼故乡》…等诸多小说，反映大自然的创伤、珍禽异兽的绝迹、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生态环境的恶化，并用艺术之笔描绘出象神话般的和谐圣地，以“生态人类学”、“生态哲学”的高度，勾勒出“诗性地理”环境和世界。^[2]赛音巴雅尔的《干河床》、《绿血》，莫·哈斯巴根的《人参娃》，孟和的《鹿花狼》，金宝的《魔鬼岭》，巴布的《大地的伤痕》、阿

尤尔扎那的《野驴出没的戈壁》…等，都反映了这一现实。

进入新世纪以后，2001—2008年间，生态小说的数量与日俱增。据初步统计，已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有80多篇（略），中篇小说有12部（略）。长篇小说有7部，它们分别为：额尔敦陶格涛的《在苍天的门槛前》、阿云嘎的《有声的戈壁》、哈斯宝力高的《四面八方》、乌·斯日古楞的《迁徙无尘》、齐·莫日根的《复活的草原》、阿云嘎的《燃烧的水》、孟和的《阴山殇》等。本文主要对上述7部长篇小说进行思想倾向阐释和条理化概括，并对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提出个人见解。

随着“生态意识”的复苏和“生态小说”的繁荣，相关评论和研究文章亦逐渐多了起来（本人新近出版的《蒙古族现代文学史》中亦有专题概述），生态问题和生态文学成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亮点。诸如有关节约用水的警告：“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诸如有关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格言：“珍惜吧！人类唯一的母亲地球”等等，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或捕风捉影的闹剧。

二、生态小说的思想倾向

（一）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的关系

生态小说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其主题和思想倾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语言艺术，形象地宣传人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相互依存，和谐共进的道理与美好的理想。阿云嘎的（微型）长篇小说《有声的戈壁》中描绘了在牧区四次开荒（开垦草原）的经过与最后的结果。第一次开垦草原是1960年代初，第二次是“老首长来了之后”，第三次是“在内地有人饿死”之后，第四次是1972年夏天“农业学大寨”之时。就这样，在戈壁上建起了农场，“麻黄素厂”。此间，戈壁在忍受中前前后后共发出5次震耳欲聋的巨响，刮2次沙尘暴，向人们发出警报。然而，人们还是无动于衷，仍向草原进发。^[3]小说中没有议论和评判，只有描绘和展示。但是，从字里行间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所关注的如何正确处理好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工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关系

阿云嘎的第二部生态长篇小说《燃烧的水》（标有“微型小说”字样）中，利用民间文学或通俗小说“寻宝”母题，讲述了有一个名叫赛希亚的西方传教士根据他曾祖父写的日记，到东方来“寻宝”。在“距今80年前”来到大戈壁，盖起了基督教堂，以百倍的疯狂寻找和勘察“能燃烧的土”和“能燃烧的水”——石油。他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埋下了百年的祸根。在大戈壁上“寻宝”的活动延续了百余年，殃及三、四代人。最后，终于在戈壁上建起了“炼油厂”。它是工业文明的胜利，给“落后”的戈壁草原带来了科学、进步之光，同时亦给草原植被、空气、地下水、牲畜以及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以“炼油厂”的起火、爆炸为代价，同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一起，在“野火”般的熊熊烈焰中变成了灰烬。^[4]这是为什么？由于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事故调查小组”也没弄清楚“这是为什么”。只有一名初出茅庐的实习研究生倒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人类每一项科学发明，都以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云云。或许，这就是小说想要揭示的工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关系问题。

（三）人与动物的关系

额尔敦陶格涛的长篇小说《在苍天的门槛前》描述了人对动物（家畜）的敌对、虐待、打击的恶劣行为和野蛮的做法。起初，巴音塔拉草原上的人们根据上级的指令，开展了砍伐森林、消灭野狼的运动，其结果“那年春季黑风大作，夏季连一滴雨水都未降。太阳晒得大地直冒烟，草木都干枯了”，只活下一棵树和一峰骆驼。在以后的残酷的岁月里，灰母驼留下的孤驼羔“缨穗峰”慢慢长成为大驼，但它躲到天涯海角始终未能逃脱出人类施加的劳役和虐待。它去过农村、草原、沙乡和戈壁，遇到灰狼、农民、牧人、二赖子和偷猎者，所到之处都受到万般苦痛和虐待，最后血淋淋地死在偷猎者的枪口下。^[5]从中不难看出，作者严肃地批评了人类处处“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蔑

视、虐待、残害和灭绝一切有生的不道德的行径。人和动物应该是朋友，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由于人的堕落，我们失去了许多朋友，令生存环境与日俱下，愈来愈乏味、恶化了。

（四）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关系

乌·斯日古楞的长篇小说《迁徙无尘》中描写了牧区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所发生的新变化。原来，当地牧民遵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游牧生活方式，依赖旧意识老做法，循环往复地延续着原始生产方式。他们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草地“超负荷”、“超载过牧”，人口过多、牧地缩小、环境恶化等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会给传统的牧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结果草原沙化，旱灾、虫灾不断，牧业生产滑到崩溃的边缘。在血的教训面前人们开始醒悟了，他们说：单纯的草地牧业时代已过时了，在生态恶化、草地缩小和市场经济排挤下，采取减少牲畜头数、提高其质量、种植饲料、封闭草场、恢复植被、舍饲与游牧相结合等有效举措是发展牧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出路。小说以“人的觉醒”结尾，在呼和塔拉草原实现了“无尘的游牧”。[6]所谓“无尘游牧”就是说，在草原实现了绿化，恢复了生态平衡。显然，这是作者把政府的现行政策当作通向理想之国的桥梁来宣传的。

（五）领导干部与人民的主动性

哈斯宝力高的《四面八方》中，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后到牧区任职—当苏木长的基层干部布仁的形象，他发挥自己所学之长和主观能动性，依靠广大牧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实际出发，根据草原日益沙化的现实，进行大胆的改革，实施“封牧”、“休牧”、“轮牧”和“舍饲”等有效措施，逐步改变了恶劣的生态，在牧区实现了城镇化。[7]这与上文《迁徙无尘》一样，热情宣扬了政府的现行政策，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值得赞许的是作者在恢复生态平衡的问题上，将“人的觉醒”、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放在了首位。

（六）人的主人翁精神与主导地位

齐·莫日根的长篇小说《复活的草原》讲述了水草丰美的巴音塔拉草原，在“大跃进”的年代被开荒者们垦殖并建立农场，致使草原退化为荒漠的现实故事。小说的主人翁乔树春跟随他父母逃荒来到巴音塔拉草原后，因饥荒成了孤儿。后来好心的牧民胡日勒把他养大成人。从小在草原生活、成长的乔树春，对养育自己成人的草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他生活的环境—草原、牧民、养父及其女儿乌日汗之间，便培育出了一种深厚的乡情和爱情。于是作者通过乔、乌二人的爱情（蒙汉民族的亲情）和乡情，展开了开垦与反开垦的斗争生活。然而，开垦是政府行为，合法的。所以，乔、乌二人的历史性地失败是可想而知的。新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草原带来了勃勃生机，政府给乔树春平反昭雪。从此他得到了草原主人的权力，与他恋人乌日汗并肩战斗，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绿化草原。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巴音塔拉草原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风貌。[8]小说热情、深刻地宣扬和突出了被人为破坏的草原亦能复活的美好理想，高度形象地肯定了植树造林、退耕还牧的现行政策，亦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9]的精神。小说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主人翁精神和主导地位。

（七）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孟和的《阴山殇》以20世纪20—40年代的原乌兰察布盟右公旗、左公旗和中公旗当权者—贵族、富豪、僧俗封建主们相互争权夺利的历史真实为背景，描绘当地山川草地、风土人情的同时，着力刻画了人与飞禽走兽、人与山水花草和谐相处的美景。当时，由于从西边“黑军虎视眈眈，时而吞噬土地”；从东边“黄军垂涎欲滴，伺机掠夺百姓”；中间“旗军东奔西突，烽火四起”；各种势力之间明枪暗刀，勾心斗角，占山为王；搅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10]这一历史性的民族灾难，给草原人民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生命的灭顶之灾，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这样，保护和发展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建立和谐共进的社会，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对天堂般草原甜蜜的回忆和回过头来面对千疮百孔的山河时，不仅让他陶醉已消失的人间乐园的同时，又叫他声泪俱下地失声喊出了：“你在哪儿？你去哪儿了？…”等绝

望的呼唤。“失乐园”的剧痛不言而喻。

上述 7 部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种改善生态的积极努力和探索的产物。其中有些作品，从理想主义出发，为未来的草原描绘出了人间天堂般的美景。在此前后的 200 余篇（部）中、短篇小说，亦从不同的角度艺术地展现了人和大自然、人和动物、人和土地、人和水草、人和家畜… 等的种种关系（这是本文产生的前提条件，笔者已刊发相关论文，并出版了文学史。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从小说所昭示的思想倾向看，作家们在生态问题上所极力渲染的上述众多而复杂的关系中，人始终扮演着万物之灵长、智性动物和统帅一切的角色。因此，作家们用曲折复杂之笔将人形容为大自然的情人、主人、敌人、奴隶、孩子、保护神等等。然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主人”与“敌人”、“索取”与“给予”的线型关系，而是相依为命、共损共荣、互动共进，成为一种生态伦理关系的有机整体。当那些神话般的“桃花源”、仙境般的“宝木巴圣地”，在新的“文明”面前逐一消失；当那些珍禽异兽、异花奇草、青山绿水，在“开发”的号角声中相继绝迹时，居然还有一些人仍在高举向大自然进军的旗帜，喊着“人定胜天”的口号，继续毁灭着大地母亲。对此，生态小说诚恳地向人们呼吁：要继承和发扬祖先的“天人合一”、“天父地母”的生态伦理观、和谐生存观和发展观，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智面对人类“唯一的地球”。

三、生态失衡的探索

生态失衡是世界性的大问题。由于各国和地区的国情、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的不同而生态失衡的程度和表现形式都不一样。20 世纪 80—90 年代初期的蒙古文生态小说，着重描写了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种种恶劣的做法。其中揭露挖蕨菜、撻发菜、刨苻蓉、拔麻黄、采奇石、偷猎、偷伐… 等不法行为的居多。到 90 年代中期后，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主，深挖人的原始本真一天人和谐观，描绘先民们崇拜天地万物、崇拜大自然的意识，从而以百倍的热情讴歌了原始文明，呼唤那正在失去的“桃花源”和“宝木巴圣地”，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请参考我《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步入新世纪以后，多数作家们从理想主义回到了现实主义，直面人生和活生生的现实，把笔锋转向“人”（尤其指向当权者），深刻剖析人的贪欲—野性、兽性和占有性。同时，重新解读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当然，文学不是说理艺术。然而从它歌颂与揭露、爱与恨的笔触中能够看出作者思想和情感的流向。纵观蒙古文生态小说“生态失衡”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不法分子的破坏

小说中反映有一些不法分子涌入草原，挖药材、淘金、采石、采矿、偷猎、偷伐，破坏植被、破坏生态、破坏食物链。日久天长，直使草原变得千疮百孔。这是一种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容易识破，亦最能引起公愤），所以治理起来比较顺手。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态意识。要进行正面教育，唤醒他们的爱心，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大自然。

（二）不科学地滥垦滥伐滥开发

大面积开垦、大面积砍伐、无计划地开采等，这是政府行为，合法的。所以，无计可施、无法制止。这正象在《有声的戈壁》和《燃烧的水》中所描绘的那样，即使是国家和人民蒙受到巨大的损失，亦不能随便下结论，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能沉默。然而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人们多次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语）^[11]之后才悟到的一条真理。

当前，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所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

调,实现良性循环”。[12]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执行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作家们先行了一步。这是值得赞许的。

(三) 社会主体一人(主人)的堕落

“人”是我们这个地球、世界的主人。他的身份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这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任意摆布、摧残、破坏这个世界。而是说,“人”作为社会的人,他是“社会各种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其中就有一条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明白了这一条,就应该懂得作为主人的“人”的天职了。然而,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人”要做好,真不容易。根据小说中所反映的内容,有一些人却是丧失了天职,把这个世界、地球、土地、水草、森林、矿藏、飞禽、走兽…等都当作了自己任意占有、随便残害的对象;而另一部分人则丧失了主人的责任心,玩麻将、玩女人、赌博、酗酒、偷盗,将义务、权利都抛到脑后,荒废了山川、土地、水草,失去了牛羊、失去了乐园。

尤其作为主人的个别地方官员,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公肥私,腐败堕落,或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滥垦、滥伐、滥开发;或从个人主义出发作权钱交易,出卖土地,私营矿产…等等。

经过我们的归纳,可以认为上述三条是“生态小说”中所探索的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围绕这些探索,展开了生态与爱情(齐·莫日根的《复活的草原》)、生态与文化传统(《满都麦短篇小说选》中的多篇作品)、生态与权力(阿云嘎的《有声的戈壁》等)、生态与法律(巴图苏和的《岩羊岭》,白芙蓉的《黎明前降的露水》)…等诸多故事。作家们凭借这些故事的艺术感染力,力图催生和强化读者的生态意识,以全民族的先进思想意识和科学发展观来保护、发展、美化生存环境,为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一种时代精神,现代意识。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3]据此,我们可以把生态问题放在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当中去考察,这是解决上述各种关系的正确渠道。

其实以上三条都离不开“人”,不管是“不法分子”还是领导干部,或者是“主人”,归根到底都是“人”。所以,“人”是破坏生态平衡的主要力量,是罪魁祸首。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生态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生态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最终还是要遵照毛泽东思想,把人放到实践当中去,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是生态小说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亚洲游牧文明遗产[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4—6.
- [2]苏尤格.天人和谐 生态哲学[J].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3).
- [3]阿云嘎.有声的戈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4]阿云嘎.燃烧的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5]额尔顿陶格涛.在苍天的门槛前[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 [6]乌·斯日古楞.迁徙无尘[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7]哈斯宝力高.四面八方[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8]齐·莫日根.复活的草原[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
- [9]邓小平.植树造林[M].1982年11月.

- [10] 孟和. 阴山殇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83.
- [12] 江泽民.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M]. 1995, 9, 28.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82—283.

The Mongol eco-fiction at the new century

QUAN Fu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uthors write the eco-fiction from the early tim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y write down the novels which were reflect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rite d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The author analyses seven Mongolian novels and interprets it in three parts. They are “recovery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eco-fiction” and “exploration unbalance of ecology” etc.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human beings are the main groups who are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after waking up the human being’s ecological realization then solve lots of ecological problem.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eco-fictio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deological tendency

收稿日期: 2009-04-20;

作者简介: 全福 (1946--), 笔名苏尤格,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语系教授, 蒙古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蒙古族文学和文化学。